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ANGYUN YISUZHENG'YA LUNKAO

王筠『以俗证雅』论考

刘家忠 魏红梅 ■ 著



WANGYUN YISUZHENGYA LUNKAO

王筠『以俗证雅』论考

刘家忠 魏红梅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筠“以俗证雅”论考/刘家忠、魏红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161-0097-4

I. ①王… II. ①刘… ②魏… III. ①《说文》-研究
IV. ①H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0199 号

责任编辑 门小薇
特邀编辑 叶昕媛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徐传武

地域文化研究，是目前许多地方性高校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和重点。虽然这种旨在挖掘整理地方文化资源的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也很难用量化的数据来统计，但是通过这种研究来了解这方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文化活动及成果，以及这一区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所占的地位和影响，无疑具有某种学术史的意义，至少也能使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现代人避免“数典忘祖”的尴尬。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大学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学校开展通识教育、提高师生人文素养的宝贵资源。因此，高校教师以地域文化为研究课题，具有学术及现实实践的双重意义。但在选择某种地域文化现象或者地方文化名人作为科研论题时，还必须考虑到以下两方面因素：第一，这种文化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它必须是在这方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或是与这方土地的历史及现实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第二，这种文化的意义及影响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在整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甚至在当今国民的精神生活中仍发挥着某种或隐或显的作用。刘家忠、魏红梅先生的这部专著，围绕清代潍坊安丘籍学者王筠运用活的民俗材料来释证《说文》、批驳诸家之说这一研究特色展开论述，既是文字学的课题，也属于地域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个选题本身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从历史文化积淀的角度看，潍坊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这里曾经是北海故国，先后孕育了牟融、管宁、郑玄、徐干、刘熙、刘孝标、张择端、赵明诚、冯惟敏、刘墉、王筠、陈介祺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小学等学术领域给后人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富矿”。当然，要将古

王筠“以俗证雅”论考

人遗留下来的这极有价值而又极为丰厚的文化资源变为富有现代意义的学术成果，还牵涉到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的问题。因为这批历史人物不仅仅是北海文化名人，更是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为中华传统文化贡献了才智，留下了丰厚的人文遗产。他们的著述本身即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后人对他们学术成就的研究也积累了相当丰厚的二次、三次文献。如何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另辟蹊径，有所发明和突破，研究视角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即以王筠为例，他是清代“说文”研究四大家之一，他生活的时代距今也不过两个世纪，但自民国初年以来，语言学界对王筠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据我粗略统计，除了数百篇的研究论文之外，近些年还出版了好几部研究专著和学位论文。面对这样的研究现状，如果我们还是沿袭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王筠，恐怕花的力气再大，也难有大的收获。这里不仅关乎学力深浅的问题，更关乎研究视角及方法的新旧问题。其中的道理，学问中人是不会不明白的。

可喜的是，潍坊学院刘家忠、魏红梅先生撰著的《王筠“以俗证雅”论考》一书，既选择潍坊安丘籍王筠的《说文》论著作为研究对象，又不囿于传统的研究思路及方法，而是选取了王氏《说文》著作“以俗证雅”这一特色为研究对象，从“王氏说文四种”中搜罗爬梳出他所运用的方言俗语、农事农谚等民俗材料（这些材料既属于鲜活的乡土文献，也是一种流动的文化传统），并结合当今安丘及其周围地区的方言调查和实物验证，将这些材料逐一进行分析、归类、评判，以此来研究王氏在《说文》学史上的成就及特色，评析其研究方法的优劣得失，给当今语言学界、尤其是文字学界之《说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仅就作者横跨民俗学和文字学两个学术领域，兼采多种研究方法这一点来看，我认为作者的学术视野是相当开阔的，学术视角是相当新颖的。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可能有人认为有点“避实就虚”的味道，但“人若实之，我则虚之”，这“避实就虚”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创新。

此外，作者们为了这项研究，对于与之有关的前人和今人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说无巨无细，“竭泽而渔”了。而且，作者们对这些研究成果，整理爬梳、评判剖析极为细密严谨、犀利透彻，因而常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作者们治学态度之虔诚，对乡土文化之挚爱，对学术事业之负责精神，对研究对象之精审态度，保证了本书的研究质量。拜读本书，让人感到作者们慧

眼独具处颇多，发明创获处颇多，值得回味击节叹赏之处亦颇多。我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了，相信读者读后，定能如我有同样的感受。

以上是我粗略读书稿后的一些印象与感想，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辛卯年仲春于山东大学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 言

该书是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关于王筠〈说文〉著述的民俗学解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8JDC087。

东汉许慎之《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问世以来，从唐代的李阳冰开始，历代都有学者对这部著作进行校勘、传抄、考订、训释的工作，由此逐渐形成了我国文字学研究的骨干学问——“说文学”。“说文学”的鼎盛时期是清代中后期。由于受清代严酷高压的政治环境以及严谨求实的学术风尚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因治经的需要而转向《说文》研究，《说文》被推崇为“天下第一种书”，认为“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①可见，《说文》超越了经学的光芒而成为当代显学，涌现了一大批研治《说文》的名家学者。从数量上来看，据《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所著录，清人存世的《说文》研究著作近400种，远远超越了历代《说文》研究著作的总和。从内容上来看，有考校文本异同的，有笺注训释的，有分析字形结构的，有研究古音古韵的，有说明引申假借的，有分析六书、重文或引经的，有诠释义例的……分门别类，几乎无所不有。尤其是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家，用毕生精力钻研《说文》，每个人的研究方法虽不尽相同，然各有发明创获，成为清代小学家之翘楚，将清代的《说文》研究推向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清代的《说文》研究，尽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但从今天的学术立场来看，清儒的《说文》研究仍普遍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正如何九盈先生所指出的：“清代语言学的复古主义倾向，还表现在他们对现实语言问题漠不关心。多数语言学家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甚至对汉以后清以前一些研究活语言的著

^① 王鸣盛：《说文解字正义·序》，黎经诰《许学考》，（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427页。

王筠“以俗证雅”论考

作，评价也非常之低。他们在活语言研究方面成绩最差，远不如元明二代的语言学家。在研究方法上，有的人过分强调考据，甚至为考据而考据。乾嘉以后的语言学家，统观全局的能力，分析的能力，越来越差。有的人终其一生只会爬梳材料，堆砌材料，引不出科学的结论。这说明传统语言学已经走向终点，必须要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对之进行新的改造，传统语言学才能别开新面。”^①清儒的这种局限，概况起来就是两点：一是引用材料单一，主要以传统的书面文献和出土文物为研究对象，而对当代活的语言材料不屑一顾。如乾嘉考据学大师钱大昕就公开嘲笑一些人“乃以俚俗之言，诠释经典”^②，表现出迷信书证的固陋心态；二是研究方法单一，为考据而考据，对于考据以外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比较分析、以俗证雅等绝少使用。由于这两大局限的存在，就决定了清儒的《说文》研究无论怎样殚精竭虑、皓首穷经，也无法突破传统语言学的藩篱而进入现代科学的语言学研究。

相比之下，作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清儒的这种时代局限，尤其是他将俗事、俗物、俗语、谣谚等活的民俗材料运用于《说文》研究的方方面面，既以民俗材料与文献材料互相参证，来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读音及其意义，又以民俗材料来批评诸家之错讹，对许慎原书及同时代的相关论著多有纠谬补阙之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乾嘉考据学泥古非今和烦琐考证的弊端，打破了“雅言”与“俗语”的界限，使得原本深奥枯燥的“小学”变成了一门充满趣味的活学问。王筠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本身就具有现代语言学的某些特色，或者说，他是将现代民俗学运用活材料、重视调查分析的研究方法，与传统文字学注重书面文献考证的考据方法结合得比较好的学者。他的《说文》研究真正做到了“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考古而通今，援俗以证雅。因此可以说，“以俗证雅”，即重视运用活的民俗材料来研治《说文》，是王筠能在大师林立的清代小学家队伍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也是王筠研治《说文》最大的特色。

然而可惜的是，王筠研治《说文》的这一特色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王筠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他对《说文》全书条例的阐释；二是他运用金石材料来佐证汉字本义的研究方法；三是

①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② （清）阮元：《经籍纂诂·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他将研治《说文》的心得运用于童蒙教育的教学方法。而对王筠“以俗证雅”这一治学特色，却鲜有人提及，或是虽有提及但阐发不够深入。对他这一研究方法的学术意义缺乏深层次的探讨，更没有对其运用民俗材料研治《说文》的特色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出现。故笔者不顾自身之学殖浅陋，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对王筠最具代表性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说文系传校录》等著作中所使用的民俗材料，逐一进行了搜罗与爬梳，试图从民俗学与文字学的双重视角，对王筠“以俗证雅”研究方法的优劣得失作一全面论断。能否达到这一学术目标，笔者心中没有数，还是由读者评判吧。至于书中的分析论述，错讹疏漏之处一定不在少数，还望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们一定虚心接受，并致以诚挚的谢意，以便将来再版时及时补充修正。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总论王筠及其对《说文》研究的贡献与特色。既梳理了王筠的生活经历及家族渊源，又剖析了王筠研治《说文》的历程、贡献及其“以俗证雅”的特色。下编通过逐一爬梳王筠研治《说文》所使用的民俗材料，结合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当今潍坊地区的方言调查和实物证验，从析形、释义、正音三个方面，对王筠运用民俗材料研治《说文》的个案一一进行了分析论考，同时对王筠所言古籍中未见之事物，也一一进行了解读。这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本书所用之材料，主要来自“王氏说文四种”，其中又以王筠最具代表性的《说文释例》与《说文句读》为主。《说文释例》，采用的是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根据世界书局影印本影印的版本（注释中一律简称《释例》）；《说文句读》，采用的是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根据1882年尊经书局刊本影印的版本（注释中一律简称《句读》）；《文字蒙求》，采用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的影印本（注释中一律简称《蒙求》）；《说文系传校录》，采用的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十二册收录的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清咸丰七年（1857）王彦侗刻本（注释中一律简称《校录》）。《清诒堂文集》采用的是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的版本。该书中所用材料之页数，即为上述版本之页数。另外，书中所引材料之标点与注音为笔者所加，特此说明。

目 CONTENTS 录

序·····	徐传武	1
前言·····		1
上编 王筠和他的《说文》研究 ·····		1
第一节 王筠生平及其家世渊源·····		2
第二节 王筠研治《说文》的主要著作·····		18
第三节 王筠研治《说文》的主要贡献·····		35
第四节 以俗证雅——王筠研治《说文》的主要特色·····		50
下编 王筠“以俗证雅”论考 ·····		68
第一节 王筠以民俗材料说解字形论考·····		68
第二节 王筠以民俗材料训释字义论考·····		104
第三节 王筠以民俗材料说解字音论考·····		241

上编 王筠和他的《说文》研究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又字伯坚，号蓁友，安丘宋官疃（今山东省安丘市景芝镇宋官疃村）人，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语言学家、启蒙教育家。王筠与段玉裁、桂馥、朱骏声并称为清代“说文四大家”。

王筠出身于安丘的书香门第、宦宦之家，父祖辈曾任过知县一级的地方官，并非当地的名门望族。王筠于道光元年（1821）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国史馆誊录议叙选山西乡宁知县，并曾权知曲沃、徐沟二县。王筠少喜篆籀之学，进而博涉经史，一生潜心治学，笔耕不辍，“于书无所不窥，一生著述之富，校订之精，道咸以来学者，罕有其匹。刊版流传者，仅十之三四而已”。（《清诒堂文集》第300页）据郑时先生的《王蓁友先生著述考》统计，王筠一生自著书约有47种，勘订他人书约有58种，可谓著述宏富。但这些著作刊行面世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数著作手稿在王筠去世后散佚。《清史稿》、《续安邱新志》、《乡宁县志》、《山东通志》、《山西通志》均有其传。

王筠一生，尤精《说文》之学。先后撰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系传校录》、《说文韵谱校》、《说文属》、《说文广训》、《说文钞》、《检说文难字》、《钮氏说文新附考校正》、《许学札记》、《说文校议覆勘》、《文字蒙求》、《订补桂氏说文部首读》、《正字略》、《说文汇字》等《说文》研究著作。其中《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说文系传校录》，被称为“王氏说文四种”，代表了王筠《说文》研究的最高成就。

王筠为学，独辟门径，不囿陈说，善运用生活中所见、所闻之民俗材料研治《说文》，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在段玉裁、桂馥等同时代大师之外，熔铸众说，自成一家，取得了堪与段、桂、朱等学者相媲美的成就。“筠治《说文》之学，垂三十年。其书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于人，论者以为许氏

之功臣，段、桂之劲敌。”^①此论甚为允当。

第一节 王筠生平及其家世渊源

一、王筠生平

王筠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1784），卒于咸丰四年（1854），享年71岁。他一生的经历比较简单：早年随父游学于安徽潜山、阜阳等地，后随岳父到过直隶；中年以后，游走于北京与家乡之间，断断续续30年；60岁以后始任山西乡宁、曲沃等地知县，直至去世。一生走的是传统封建文人通常遵循的“读书——科举——入仕”的人生道路，并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更没有什么传奇经历。但与一般文人不同的是，王筠始终以读书治学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尤其把《说文》研究作为自己毕生治学的目标，为此孜孜不倦，精勤过人，老而弥笃，终成一代小学宗师。“先生于书无所不读，凡有所得，皆手自札记……其书眉行间可容笔处，朱墨灿然，幅溢则以登记毕之。”（《清诒堂文集》第292页）正是凭着这种超人的精勤和执著，王筠积数十年之力而成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等著作，不仅成为清代《说文》研究的杰作，而且在我国小学史上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至今仍沾溉学人。这些成就的取得，既凝聚着王筠毕生的心血，也体现了他献身学术、淡泊名利的学者情怀。因此可以说，王筠的一生，确是研究《说文》的一生，不愧为一代小学之宗师。

由于《清史稿》及现存方志中对王筠生平事迹的记载比较简略，现结合20世纪30年代郑时所著的《王棻友年谱》，对其一生的行实略作勾勒考证如下。

（一）南北游学，读书应试的青年时期（30岁以前）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初一辰时，王筠出生于山东青州府安丘县

^①（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79页。

东南四十里之宋官疃。是年其父王馥超（字约斋）27岁，其祖父王周（字念复）51岁。

王筠幼而聪异，读书求甚解。幼年时，父亲仕宦在外，他大部分时间在家跟随祖父读《四书》、《五经》等科举读物，直到11岁那年才正式拜塾师王惺斋（字朝轺）为师，专攻举子业，对学问之道仍在摸索之中，其间并无良师益友可以切磋求教。他在《送光寿堂先生序》中自述道：“余居渠邱之鄙，为穷乡僻壤之地。无高山大泽，以涤荡其心胸；无修竹茂林，以发明其耳目；又无秘书，以恣探讨；明师益友，以相与切磋琢磨，盖汨没于其中者十有七年矣。家君居京师，读书为人之道皆得之大父。犹忆十一岁时，家君寄谕曰：‘人不可眼孔小。’于是胆少壮，而未深悉其理，遂以不敢妄自菲薄之意，转而为不敢菲薄斯人之心。故论人则以圣贤律之，论诗则以杜、李、王、孟律之，论文则以秦、汉、唐、宋律之。而所遇之人，多不能如所望。”（《清诒堂文集》第100页）他在《教童子法》中记其幼时读书所受之苦曰：“读《四书》时，见《大学》、《中庸》注，皆题朱某《章句》，《论语》则题朱某《集注》。不知古人注书多名章句，又不知《学》、《庸》是古注粗疏，朱子创为此注，则名《章句》。《论语》则多用前贤说，故名《集注》也。又不知‘注’、‘注’是古今字转，以‘注’字为正。不敢问之师也。读《诗经》时，见《国风一》不知下有《小雅二》、《大雅三》、《颂四》也。又曰：《周南一之一》不知上‘一’字承《国风一》，下‘一’字对下《召南一之二》至《豳一之十五》言也，直以为吃语而已。亦不敢问之师也。读《周易》时，见二程子序，当时虽不知朱子乃程子再传弟子，无由为朱子作序，然疑《四书》、《诗经》皆朱子自作序，此何以他人作序也。朱注《周易》一段末云：‘今乃定为经二卷，传十卷。’核其卷数，固不符。不知朱子本义本连书于程子《易传》之后，述而不作，故谦而不再作序。朱子定本是文王《彖辞》、周公《爻辞》，分两篇居首，孔子自作者退处于后，不敢掺杂先圣之文，圣人之谦也。曰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谓之十翼。御纂《周易折中》即用朱子旧本也。明永乐时，苏州府教授删《程传》，专用本义。朱子曰《程传》备矣者，始录传于后。而序卦传之《程传》本分冠各卦之首，他不知合录于本篇，遂致序卦无一字注解。我虽疑之，亦不敢问也。惟十一岁从王惺斋师，事事皆讲，遂知用心，以有今日。夫此等可疑之事，皆属

王筠“以俗证雅”论考

皮毛，不关大体。尚无训诂者，令我独感惶斋师。愿天下之为师者，各为其心丧三年计也。”（《清诒堂文集》第224页）可见此时的王筠，已读书有疑，说明他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的好学深思之士，读书力求甚解，喜欢咬文嚼字，对字义的渊源演变尤喜追根究底。然大智者必大愚，从其幼年时过小河沟的一则趣事，就可以看出他的大智若愚：王筠幼时过小河沟，人们告诉他说可以跳过去，王筠听后，从“单腿为跃，双腿为跳”的概念出发，于是并着双腿跳落在了水中……

嘉庆四年（1799），其父王馥超远赴安徽潜山任知县。16岁的王筠有感于家乡无名师益友可请教，亦随父亲宦游江南，眼界因此得以开阔。其父期望他能早日在科第上获取功名，因此对他督课甚严。王筠亦于“读书之外别一无所好。尝观剧庭中，曲三终，默诵《周易》一过，丝肉之声嘈杂喧阗弗闻”。（《清诒堂文集》第228页）加之性格朴讷，不善交际，“不喜矫饰以悦人，能事老人，而拙于接同辈”（《清诒堂文集》第228页），以至于被仆人私下戏称为“木头子”。王筠得知后，索性作《木头子说》以自嘲。

王筠在安徽期间，先拜师于孙药亭，专意词章之学，与师多有唱和。17岁时又与县府幕僚庐陵人刘紫垣结为忘年之交。紫垣为人性情刚毅，年再倍于王筠。王筠敬之如父兄，两人亦师亦友，成为莫逆之交。王筠有过错，紫垣必正色规之，即使偶有言语不合，亦责让无已，王筠受之恬然，益加敬礼。两人朝夕相处5年，后刘紫垣因倦游而离开潜山，这一年王筠21岁。次年即嘉庆十年（1805），53岁的桐城人光寿堂担任潜邑山长，王筠与之一见如故，遂订为忘年交，两人相互切磋诗文，甚为投契。同年年底，光寿堂应须江刺史主讲席之聘而离去，王筠作《送光寿堂先生序》以赠送。嘉庆十一年（1806）八月，其父再署阜阳，次年延请桐城人方植之（方东树）于署，24岁的王筠与堂叔王志超一同从其受学。方东树是清代后期宋学派的重要人物，对乾嘉考据学派深为不满，著有《汉学商兑》一书，攻击汉学家埋头考据、见树不见林的弊端不遗余力，在当时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可能是方东树在王家任教的时间不长，或是他的学术旨趣与王筠不合的缘故，总之他的思想并未对王筠产生多大的影响。王筠后来从事的治学道路仍以汉学家的训诂考据为主，这确是一段有趣的因缘故事。嘉庆十七年（1812），其父被罢官，王筠亦随之返回家乡，这一年他29岁。

从16岁随父至安徽，至29岁回乡，王筠总共在安徽游学13年。在此期间，他先“学诗赋、古文、填词”，都因其性情不合而作罢；后又涉猎经学，喜欢篆籀，“亦不辨正俗。年近三十，读《说文》而乐之。每见一本必读一过，即俗刻《五音韵谱》亦必读也”。（《释例·序》第1页）王筠作于这一时期的《覆瓿社灯谜》、《清诒堂灯谜》可视为是他走向文字学研究的尝试之作。其嗣子王彦侗在《覆瓿社灯谜》跋文中说：“公方弱冠，约斋公为延桐城方植之先生教读于阜阳署中，而署中幕客皆为一时名流，故每值公余之暇，辄以诗词相赓和，间亦作灯谜解颐。公之诗词则有《清诒楼稿》、《覆瓿集》，而灯谜则只数百首耳。”^①

嘉庆七年（1802），其父再署阜阳期间，19岁的王筠与胶州名士高薰业之女高梦萱阁结婚。高梦萱阁曾受业于满人那彦成易堂的第六个女儿枝止，是个才女，亦爱好文字之学，与王筠的《说文》研究多所唱和。王筠后来完成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等著作，亦间采夫人高梦萱阁之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30岁之前的王筠基本上是在家乡安丘和安徽潜山、阜阳等地度过的。其从父游学及结交南方文士的求学经历，为他后来从事《说文》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他也初步确立了自己今后的治学目标和方向。

（二）专治《说文》，勤于著述的学术成熟期（30岁至60岁）

嘉庆十八年（1813），30岁的王筠在家乡参加乡试落第。次年，其岳父高薰业官仕直隶，王筠跟随岳父前往直隶清苑、遵化等地读书，仍在为科第功名而奋斗，课余钻研《说文》。嘉庆二十一年（1816），33岁的王筠为养家糊口计，游学于京师，开始了边设馆授徒、边治学的生活。这年九月，《说文》研究大家段玉裁去世，享年81岁。王筠读《说文》已历年所，颇有心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段氏分道扬镳，且时露攻击之处”。嘉庆二十四年（1819），36岁的王筠“应顺天乡试”，这是王筠的第二次乡试，虽仍然未能考中，但他“挑取誊录”而开始“供职于京师”，从此步入了仕途。道光元年（1821），38岁的王筠又回山东参加乡试，以第34名中式顺天榜举人。他应试

^① 王筠：《覆瓿社灯谜·跋》，《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二十五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王筠“以俗证雅”论考

时的五道对策，分别对传经、史书、科举、农业、风俗进行了论述，行文洋洋洒洒，见解精辟独到，受到座主（主考官）徐颀（字少鹤）的欣赏，全部得到推荐。特别有趣的是，王筠的《策一》从字形演变的角度考辨了《仪礼》的一处文字讹误：“‘问王’乃‘问玉’也。《说文》三画正均为玉，中画近上为王，真书加点以别之，此篇名著篆文耳。”（《清诒堂文集》第3页）徐颀曾受业于段玉裁，亦喜文字音韵之学，对此考辨大为赞赏。

道光三年（1823），40岁的王筠开始专攻《说文》，正式把《说文》作为“身心性命之学”，潜心研究起来。其《葦友臆说序》云：“或学而有得，或思而有得，皆札记之。”刘耀椿《王葦友先生墓志铭》亦曰：“先生于书无所不读，读书有得必札记之，或识于书眉行间可容笔处，朱墨灿然，幅溢则以笺记毕之。尝曰：前人谓读书而无笔记满幅，非我书也。然读书不破万卷，不敢妄下雌黄，读书能破万卷，尤不敢妄下雌黄矣。”（《清诒堂文集》第237页）自此以后，王筠研究《说文》逐渐进入了著述不辍、渐有创获的学术成熟期。

此时，前辈考据学大师逐渐凋零，乾嘉朴学风尚也渐趋衰歇，但学术界研究金石学、小学的风气仍很浓厚，且出现了将两者结合的新的治学风尚。王筠投身于这一学术潮流中而结交甚广，与日照许瀚（字印林）、诸城刘喜海（字燕庭）、诸城李方赤（字璋煜）、汉阳叶志诜（字东卿）、道州何绍基（字子贞）、潍县陈介祺（字寿卿）、江苏陈奂（字硕甫）、海丰吴式芬（字子苾）、内阁学士翁心存（字邃庵）、体仁阁学士阮三、朝鲜大儒金善臣、朝鲜副使申在植等交往甚密，切磋探讨而互相启迪发明。起初王筠对段书的态度有失偏颇，时露攻击之处，惹得友人何绍基、汪喜孙和陈奂等都不高兴。他在许多场合议论段书的得失时，不少人作惊讶状而不敢相信，然而这更增强了他深入研治《说文》的意志力。王筠通过长期的艰苦攀登，终于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赫然名噪京都。相传王筠曾在寓所门口挂过“问字处”之类的牌子，进行文字方面的义务咨询服务。此刻，他对段书的评价比较客观，对桂书的评论也能持慎重态度。其友人许瀚在《答杨志堂书》中说：“同人厌其芜杂，欲从事删汰者甚众，鄙意云亦然。独安丘王葦友筠孝廉以为未可轻议，当时不甚解其意。”（《清诒堂文集》第239页）这说明王筠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说文》成果的基础上，对于《说文》研究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王筠为人性格耿介孤傲，不喜结交达官贵人，与朋友以学问相交，从

不以私利干求。“官至三品，即不上交”，理由是“其位既高，其任必重。往谈时事，是越畔也，往谈学问，是恩之也。”他一向仰慕王念孙父子的学识，李璋煜要引他前去一见，他笑着辞谢道：“惜其为尚书耳，否则不介而孚矣。”（《清诒堂文集》第250页）潍县人陈官俊（字伟堂，陈介祺之父）相国，是他的姻戚，而王筠曾为陈介祺的老师，但他未曾一登其门。寿阳人祁寯藻（字颖叔、淳父，号观斋、息翁）相国，素闻王筠之名，曾将自己所刻《说文系传》相赠，希望能见他一面，但王筠却无意高攀，并未造访拜谢。后来四弟王範中进士，去拜谒会试副主考祁寯藻，归来时告诉他，“师所言者，皆兄也”。过了近半年，祁相国又托亲戚张穆来请，到这时，他怕人说“以贫贱骄人”，始登祁府拜访，自此开始了文字之交，但一年上门也不过两三次而已。其性格孤介如此。（《清诒堂文集》第291页）

在与文人学士的交往中，王筠有两件逸事值得注意：

一是道光七年（1827）王筠与朝鲜副使申在植关于篆字等书法问题的探讨。《王荦友年谱》较完整地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兹摘录如下：

在植问先生曰：“足下篆法深得玉箸之余意，甚是古态，学何法帖而然也？”先生曰：“古有杜撰，今有杜篆。仆素不识字，发愤读《说文》一年，读之既熟，依样葫芦，实未临帖也。”在植曰：“仆亦少日好看篆隶，喜看秦汉诸碑。但恨东邦苦无好本，亦见不多。而今则已老矣，眼昏废学，然每见人善作篆隶，则未尝不喜之也。”先生曰：“周篆之存者止有石鼓文，秦碑则峯山已是翻刻。仆所见者琅琊台碑止二世所刻，其始皇碑为一知县刖去，不韵之至也。”在植曰：“汉隶固多见之，而篆则未之见，或有碑刻否？”先生曰：“所见汉篆止高祖《大风歌》耳。字大升许，未有款识，前人著录，传以为汉耳。”在植曰：“至唐以篆名者，李阳冰似最佳。”先生曰：“少温笔法固好，然颇不讲字体。……然宋梦英和尚则远不及。”在植曰：“梦英之笔何如？”先生曰：“陕西碑洞有之，《千字文》及《说文五百四十部首》，皆流传于世。然而颇有变易，似或尚不晓许叔重作《说文》之意也。近有段茂堂先生名玉裁字若膺《说文解字注》，共四函，京钱十二千可得。其书诚《说文》至好之本，其中有武断处，然不掩其瑜。欲识字者，非此莫由。”在植曰：“足下亦会隶字否？”先生曰：“不会。仆之